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金山谣

——美国华裔妇女史

[美] 令狐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令狐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0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2504-X

I. 金… II. 令… III. 女性—华侨状况—美国 IV. D634.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61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5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s made possible par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Publishing Subsidy fund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作 者 序

1985年,同本书将要讨论的许多中国妇女一样,我乘坐中国民航飞机,抵达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开始了随后十多年在异国学海的遨游。作为一名女性,也作为一名旅居异乡的学子,我自然地对美国华裔妇女的历史开始发生兴趣,希望在这一领域做些研究。本书的资料收集与撰写修改,历时十数载,其间我也从研究生成为教授,亲身体验品尝了华人在异国奋斗的艰辛。因此,在朴素自发的兴趣之上,又添了一层使命感,力图再现中国妇女在异国的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本书不仅希望记录她们为求生存而经历的艰辛,更欲发现总结她们取得成功的经验。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许多美国专家学者与友人的无私帮助和鼓励,得到了许多研究机构与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我的良师与益友、美国著名20世纪史历史学家艾伦·温克勒尔(Allan M. Winkler)博士不断地给予我鼓励与建议,并亲自阅读校对每一次修改稿。著名亚裔移民史专家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博士也在本书的全部写作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关切,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与具体的建议。美国妇女历史学家玛丽·弗瑞德瑞克森(Mary Frederickson)博士也始终热情不减,为完善本书,提供各种建设性的建议。历史学家刘海明博士、盖瑞·Okihiro(Gary Okihiro)博士、路易斯·魏德(Louise C. Wade)博士,和社会学家叶月芳(Stacey G. H. Yap)博士慷慨地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使本书更上一层楼。

我深深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华人妇女。没有她们的帮助,本书将难以完成。她们慷慨无私地将自己宝贵的时间与丰富的人生阅历

贡献给了本书。她们的经历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美国华裔妇女史。她们不仅热情支持本书的写作,而且许多人还成为我的挚友与忠实读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伊沙贝拉·张(Isabelle C.Chang)、陈泗桥(Sze-Kew Dun)、廖黎燕、林白燕(Pai-Yen Lin Lu)、钟灵秀博士(Alice C.Phillips)和贝拉·邵(Bella Shao)。

在我收集史料的过程中,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多研究机构与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专家与工作人员,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我特别感谢下列机构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 D.C.)、美国国家档案馆太平洋山岭地区分馆(National Archives-Pacific Sierra Region in San Bruno, CA)、美国国家档案馆中部平原地区分馆(National Archives-Central Plain Region in Kansas City, Missouri)、杜鲁门州立大学图书馆(Pickler Memorial Library at Truman State University)、迈阿密大学图书馆(King Library at Miami University)、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特藏馆(the Special Colle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纽约市立图书馆(New York City Public Library)、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the East Asian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研究图书馆(the Ethnic Studies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特藏馆(the Special Colle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和旧金山地区法院(San Francisco District Court)。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挚友、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员珍妮·普雷斯内尔(Jenny presnell),她全心全意地、不知疲倦地为我搜集并复印资料。她的友谊与支持为本书完成之必不可少。杜鲁门大学图书馆馆际借书处的工作人员希拉·斯沃福特(Sheila Swafford),通过馆际借书体系,为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深深感谢她的帮助。美国国家档案馆太平洋山岭地区分馆的档案保管员尼尔·汤姆森(Neil Thomsen)和美国国家档案馆中部平原地区分馆的档案保管员迈克尔·布洛德希

德(Michael J. Brodhead)博士的敬业精神与极大的耐心、热情,使我深受感动,难以忘怀。

我感谢迈阿密大学、杜鲁门州立大学和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教育基金会对本书的慷慨赞助。没有上述机构的经费支持,本书将难以完成。

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虽然本书的完成是作者十数年来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但许多中国的美国学专家学者的专著与论述也使我受益良多。黄绍湘博士的《美国通史简编》、刘绪贻教授与杨生茂教授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和刘伯骥先生的《美国华侨史》都使我大受启迪,也都在本书中被参考引用。同行专家们发表于中华美国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季刊《美国研究》的论文也都是我的必读文章,它们大大开阔了我的研究视野,增进了我对美国史研究的全面了解。除上述著述外,我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中国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无法一一列举,在此谨表示感谢。

我的蒙师、国际著名东欧国际关系史学家程人乾教授,为我走上史学研究的不归路,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他对史学研究的严肃认真、孜孜不倦,是我写作此书的榜样。我的母校山西大学与山西省教育委员会曾慷慨出资,大力支持我在美国进行美国史的学术研究,对本书的完成功不可没。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需要对本书的专业术语的使用以及英文人名地名的翻译做一些说明。在本书中,我使用了“中国移民妇女”、“美国华裔妇女”等术语。在讨论二战以前的旅美中国妇女时,我一般使用“中国移民妇女”或“华人移民妇女”等术语。因为在1943年美国国会废除所有排华法案之前,中国移民没有选择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在讨论战后中国移民妇女在美国的最初经历时,我也使用“中国移民妇女”一词。因为,美国移民法规定,当外国移民获取美国永久居民的

身份后,还须等待五年方可申请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从移民至美国公民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等待。在此时期,虽然这些中国妇女已定居美国,她们的法律身份仍为移民,她们仍持有中国护照,为中国公民。而在讨论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妇女(所有在美国国土出生者均为美国公民)或已获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妇女时,我使用“美国华裔妇女”或“华裔美国妇女”等术语,来重点强调她们对于美国文化的归属感。她们是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是美国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对英文人名地名的翻译中,我参照标准常见英美姓名翻译与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翻译,尽量采用已被使用过的翻译名称。对于从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英文人名地名,我根据与标准翻译相类似的翻译原则译成中文。在所有翻译名称与专门术语之后,我都在括号内附有英文原文,以便于读者查阅与该名称有关的英文书籍资料。

由于早期中国移民多来源于广东沿海各县,他们的名字多以广东地方方言的发音出现于原始史料中。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收存的美国移民档案资料,只登记有中国移民名字的广东话发音,除少数移民用中文签名外,许多文盲移民只在文件上十字划押作为签名,因而无从得知他们的确切中文名字。所以,我在翻译广东人名时,除参照常见的中国姓氏广东话发音有关资料之外,还请教一些兼懂广东话与普通话的人士,帮助翻译。因为讹误在所难免,我将所有广东话人名的原始拼写放在括号内并附在普通话译名之后。例如,“梅阿芳”(Afong Moy)。

为了尊重与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权,本书在引用口述访谈案例时,避免使用访谈者的原名,而仅使用访谈者姓氏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例如,“S女士”中的“S”为中国姓氏“宋”(Song)的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在注释中引用口述访谈时,我仅引用每一访谈者的数字编号。例如,“口述访谈第一”。

对于书中的缺点错误,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1820年,美国移民局记载了第一批抵美的华人。^[1]从此,中国学生、商人,特别是劳工源源抵达美国,直至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令限制中国劳工,移美浪潮骤减。^[2]

中国移民妇女,虽然在人数上大大少于中国男性移民,也在同时期抵达新大陆。1834年,有史可载的第一名中国妇女梅阿芳(Afong Moy),抵达纽约。随后,其他中国妇女也陆续到达美国。自梅阿芳抵美三载之后,已有1784名中国妇女居于美国,主要分布于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夏威夷和爱达荷等州。^[3]

1848年,大批金矿被发现于加利福尼亚州。从此,黄金的诱惑吸引了无数美国东北部的小业主、平民、失业者与冒险家开赴西部,挖掘黄金,也招致了大批移民从欧洲及亚洲飘洋过海,来美国实现黄金梦。黄金被发现的消息,也在19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时值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竞相将其工业产品倾销中国,导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崩溃,商人破产,手工业者失业,农民倾家荡产。南方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福建,首当其冲。内忧外患与凋蔽的经济迫使大批广东、福建的失业农民及手工业者,典卖家产,或以人身做抵押,购买船票,告别妻小,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大部分抵美的华工都怀着到美国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梦想,视美国为黄金地。美国因此被广东、福建移民称为“金山”,首批华人聚居的加利福尼亚州圣弗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也因此被叫做“旧金山”。

这一移民西部的美国黄金潮大大推动了美国西部的开发,使美国从东北部十三州逐步发展为横贯北美大陆的国家,在美国西部史

与美国经济政治及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黄金潮与美国西部开发时期(1840—1880年),由于西部生存条件原始艰苦,西部冒险家们多为单身男子。娼妓业由此应运而生,因此,以男性为主体的西部社会发展繁荣起来了。

黄金潮时期的西部娼妓,多为墨西哥裔、西班牙裔妇女,或生长于墨西哥、巴西和秘鲁的法裔妇女,以及从美国东海岸来的白人妇女。^[4]早期中国移民妇女也被骗或被迫加入娼妓业,以卖笑为生。^[5]1870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3526名成年中国移民妇女中,有2157名被列为娼妓。^[6]美国西部各州政府迫于新教教会(Protestant)妇女社团的抗议活动,自1870年始,通过了取缔娼妓法令。其中最著名的为《佩奇法》(Page Act)。该法令规定禁止娼妓入境。自此,大部分中国娼妓从良,成为中国移民商人、业主及劳工之妻。但娼妓业的罪恶与不道德仍然被美国政府及反华人士利用为通过1882年《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的借口之一。该法有效地禁止了华工及其家属入美。

但是白人劳工,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些成功地迫使美国国会通过1882年《排华法》的白人劳工,仍不满于该法的有效力。由于中国劳工勤勉吃苦,顺从听话,在美国白人罢工时,常被资本家雇用做为替补。美国资本家与种族歧视者更有意煽动美国当地工人对华工的不满,以便从中渔利。在美国历史上,白人工会一直被认为是推动排华暴力活动,迫使国会通过排华法令的主要社会力量之一。为了加强1882年排华法的效力,国会于1888年10月1日通过了《司各特法案》(Scott Act)。该法令宣布所有返华探亲的中国劳工的回返证明书(return certificate)无效,^[7]从而禁止了2万名持有该证明的中国劳工重新入境。^[8]在该法通过以前,中国劳工的家眷还可以以前居民的身份入美,司各特法则有效地禁止了这些华人移民妇女入美。但中国商人的妻女仍可以以前居民的身份再次入境,与其丈夫或父亲团聚。^[9]上述排华法令大大限制了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因

此,自 1870 年以来,中国移民妇女的人数保持在仅 4000 名左右长达近半个世纪。^[10]

在 19 世纪后半期与 20 世纪初,做为洗衣店主、中餐馆业者、杂货店主、农夫、厨师以及劳工的妻子,这些早期中国移民妇女时常面临生活的艰难困苦,当地白人的歧视与敌意,日日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她们的日常活动包括煮饭洗衣、带孩子。除家务事外,生活在乡间的移民妇女还要管理菜园,贮存蔬菜与水果,喂养家畜,下地种田;同时居住于城镇的中国移民妇女则要帮助他们的丈夫管理洗衣店,餐馆与杂货店,终日辛劳。惧于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暴力排华活动,这些早期移民妇女的活动天地仅仅局限于当地华人居住区域唐人街的陋室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至战后的一段短暂时期,美国政府与各界对中国及华裔的歧视与敌视态度开始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做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成员之一,进入同盟国四强的领导集团(其他三国为美国、英国与苏联)。中国军民在中缅战场的浴血抗战,也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敬佩。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开始改变。同时,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又一向以开明激进著称。在这一系列有利的内外因素推动下,罗斯福总统于 1943 年 12 月 13 日签署《废除排华法令》(Repeal of Chinese Exclusion Acts)的文件,宣布自是日起所有排华法令无效。从此,排华法被一一废除,有利于华人移民的法案被国会通过,中国妇女开始以军人未婚妻、军人妻子、战时错置人员(displaced person)、难民以及美国公民妻子的各种身份进入美国。为奖励包括华裔在内的在役与退伍军人,美国国会于 1945 年至 1950 年通过一系列法令接纳他们的外籍妻子入境。1945 年 12 月 28 日,《战争新娘法》(War Bride Act)被通过。该法令规定美国在役军人的外籍妻子(只要该婚姻在该法通过前或通过 30 天之内生效)可以入境并有权申请成为公民。据美国移民与归化局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s)的年度报导,在该法被实行的三年之内,约有 6000 名中国妇女做为军人妻子被接纳入境。1946 年 6 月 29 日,国会又通过了《军人未婚妻法》(GI Fiances Act),允纳美国军人的外籍未婚妻入境。在该法实行的三年期间,有 91 名中国妇女被接纳入境。

1948 年的《战时错置人员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与 1953 年的《难民救援法》(Refugee Relief Act)是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大陆突变的政治局势而通过的法令。1949 年 10 月,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长达 28 年的奋斗中,终于战胜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在此之前,不少国民党的要员大亨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纷纷转移资产,疏散子女到香港、台湾、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在国民党院外活动集团(China Lobby)的压力下,美国国会于 1948 年 6 月 25 日通过《战时错置人员法案》,允许这些逃离中国的移民将其在美身份从临时访问转为长期居民。约有 3465 名“被错置”的中国学生、访问人员、海员及其他人员运用该法成为美国长期居民。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国会又于 1953 年 8 月 7 日通过《难民救援法》,给予 2000 名持有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的中国人入美签证。截止到 50 年代,在美国的华人妇女数目已达 40621 名。^[11]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妇女加入就业者的行列。移民妇女的就业机会一般局限于无技术性的职业如缝纫、餐馆招待业、家庭服务业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同时那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妇女则大多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因而有机会进入职业妇女圈。一些杰出的第二代华裔妇女更成为作家、律师和学者。王玉雪(Jade Snow Wong)出生于旧金山唐人街的一个中国移民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一名陶瓷工艺美术家与作家。她将自己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作为第二代华裔妇女所体验的由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而引起的失迷、困顿的心路历程,写成自传体小说《第五个中国女儿》(Fifth Chinese Daughter),畅销一时,尤为第二代华裔妇女喜爱。埃玛·卢

(Emma P. Lum)被任命为旧金山市的律师。罗斯·李(Rose Hum Lee)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当选为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Roosevelt University)社会学系主任,成为著名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一些杰出的华裔妇女如吴建雄博士成功地进入高科技领域,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60年代,美国黑人发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在此运动的冲击下,美国政府被迫通过法令,调整政策,注意保障美国黑人的各项权利。民权运动不仅提高和改善了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也使其他少数族裔受益。华裔自此冲破种族偏见,社会歧视的藩篱,逐步进入主流社会(mainstream society)。迫于美国联邦政府大众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的关于优先录用少数族裔与妇女规定的压力,美国三大电视广播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在1971年雇用第二代华裔女记者宗毓华(Connie Chung)为该公司节目主持。宗毓华工作勤奋刻苦,脱颖而出为美国电视广播业女强人。1981年,美国华裔女建筑师林璠(Maya Lin)才21岁,还是耶鲁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她设计的越战纪念碑蓝图便从1420件参选作品中被选中。1982年纪念碑完工后,这座黝黑的V字形巨墙,默默提醒人们越战的沉痛教训,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1996年,年仅15岁的华裔冰坛新秀关颖珊(Michelle Kwan),以其成熟、完美的冰上技巧,夺得世界女子花样滑冰冠军。

一些其他美国华裔妇女也活跃政界,被任命联邦政府要职。作家与社会活动家包柏漪(Bette Bao Lord)与她的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丈夫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于1985年至1989年出使北京。第一代移民妇女赵小兰(Elaine Chao)在1989年被布什政府任命为交通次长,成为华裔中的最高政府官员。同年,第一代移民妇女张之香(Julia Chang Bloch)也被布什政府任命为美国驻尼泊尔大使。

虽然中国妇女在近数十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们

仍然被学术界冷落,为美国公众所误解。始自中国妇女到达美国,她们便一成不变地被美国大众媒体报导为性感乖顺、神秘诱人的玩偶。据《商业广告》(Commercial Advertiser)记载,当梅阿芳在 1834 年抵达纽约时,她是被做为展品“身著中国服装”,“向纽约美女们展示中国女子的不同风韵”。^[12]一个称作“中国博物馆(Chinese Museum)”的巡回演出团体,也将中国女子描绘为“奇异”、“精妙”的玩物:“中国美人潘叶可(Pwan-Yekoo)女士以她独特的中国服饰吸引了所有百老汇的观众。她迷人、狡黠、活泼和雅致。她的一双小脚更是绝妙!”^[13]《哈泼斯周报》(Harper's Weekly)于 1858 年 1 月 30 日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妇女的文章。文章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中国女子的奇异发形,她们的缠足与服饰,并戏谑说:“这些长得像狒狒的香港女人尝起来一定像芒果。”^[14]这些描绘中国妇女的早期媒体形象并没有失势,在今天仍然影响报刊杂志对中国妇女的报导。许多文章广告仍然将中国妇女视为可以招揽读者与顾客的诱饵。即使是在 70 年代创刊的著名的女权主义杂志《女士》(Ms.)也不能摆脱巢臼。在该杂志上刊登的一篇广告中,一名东方女子斜卧躺椅,伸出一双大腿,为某公司推销长筒丝袜产品。^[15]即使在今天中国华裔妇女依然被视为舶来品、性感动物,为传播媒体所利用。

在电影戏剧中,美国华裔妇女同样被描绘为性感诱人的玩物。在传统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女子不是怪异冷酷,就是妖冶迷人,用以陪衬男主角(往往是白人)的英武、刚直和强悍。当代电影仍受这种模式的影响。例如 1984 年出产的电影《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其中男主角是越战退伍军人,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官斯坦利·怀特(Stanley White)。他不顾个人安危屡次深入纽约唐人街,调查犯罪团伙的活动,而女主角特蕾西·谢(Tracy Tze)则是闻名纽约的电视主播。她像斯坦利·怀特一样敬业,也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临犯罪现场,向观众直播新闻。二人在唐人街相遇,演出一场精彩的爱情戏。虽然该剧的编导一方面将特蕾西·谢描绘为职业女强人以反

映美国华裔妇女的现状,一方面仍为传统模式所局限让特蕾西·谢表现为一个有心计、性感狡猾的女人。^[16]1986年出产的电影《中国女孩》(China Girl)虽远不如《龙年》那样大受争议,但仍不脱旧俗。该剧的背景同样置于纽约唐人街,是一出现代的罗密欧与朱利叶爱情戏。纯洁可爱的华裔女孩特安(Tyan)与意大利裔男青年托尼(Tony)相爱。两人分别居于毗邻的纽约唐人街与纽约小意大利城。两个少数族裔居住区的居民,风俗习惯迥异,相视为敌。两个相爱的年青人必须先冲破种族与文化隔离,才能获得幸福。该剧同样渲染唐人街的暴力与犯罪,同样将特安描绘成一个性感迷人但软弱无助的弱者。

不同于上述电影,华裔电影编导韦恩·王(Wayne Wang)于1985年编导的《点心》(Dim Sum)则从现实敏感的手法,从正面宣传华人文化。该电影侧重描写第二代华裔女青年杰洛尔丁(Geraldine)的内心世界美及其与母亲的亲情。不同于其他美国青年,杰洛尔丁在成年与就业之后仍同母亲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年迈的母亲。为了母亲,她曾一再推迟婚期。^[17]这种表彰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电影,一扫往日好莱坞的渲染暴力与色情的乌烟瘴气,以其清新写实的风格,逐步成为由华裔创作编导,反映华裔生活的电影的主流。而90年代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则比《点心》更上一层楼,更加细致入微地描写中国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文化冲突而引起的四对华裔母女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具有意义的是,四个第二代华裔女性均能在这种文化差异与冲突中,发现或重新发现自我,并加深对母亲一代的了解与敬意。《喜福会》不仅为大多数华裔,特别是第二代华裔青年喜爱与认同,而且深受美国其他族裔的欢迎。

在这种新风气的影响下,以多种文化形式表现亚裔美国人新风貌的全美亚裔美国人电影大众传播协会(NAATA,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于1980年成立。该协会

的宗旨为教育美国公众,以准确、现实地表现亚裔新形象的作品来取代以往影视界对亚裔的反面的、一成不变的丑化的影剧,提高由亚裔美国人创作的影视作品的质量。亨利·周(Henry Chow)编导的电影《李茹》(Liru)是该协会发行的电影之一,曾获奥斯卡(Academy Award)获优秀剧作奖提名,并参加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李茹》表现美国华裔妇女对其种族特性与个人特性的索求。李茹是在旧金山长大的华裔女青年。她必须解决与母亲的关系以及与男友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必须决定是留在旧金山照顾母亲,还是飞往耶鲁大学与男友相聚。在反省回忆幼年经历后,李茹对母亲更加体贴。^[18]

由全美亚裔美国人电视大众传播协会发行的记录片《点心外卖》(Dim Sum Take-Out)通过五名华裔妇女对各自处理文化遗产的方式的对比,表现华裔妇女探求人生、种族、个人独立与性行为等重大问题的努力。该记录片表现手法明快,颇有音乐电视片的风格。^[19]由黛博拉·朱(Deborah Gee)编导的纪录片《斩龙》(Slaying the Dragon)追述好莱坞影片在过去60年中不断重复的对亚裔妇女的不正确的描写。通过电影节录和与影评人士及亚裔女演员的口述访谈,该记录片对所有表现亚裔妇女的好莱坞影片——从30年代的《巴格达窃贼》(Baghdad Thief)至80年代的《龙年》——作了一一评价,指出当今好莱坞影片所创造的亚裔妇女形象不过是往日电影中的邪恶的雌老虎(Dragon Lady),诱惑男人的苏西·王(Suzi Wong),或乖顺的日本艺妓的翻版。^[20]该片同时也评论这些银幕形象对现实生活中的亚裔美国妇女的社会与心理影响。《银色翅膀,亚裔妇女在工作中》(With Silk Wings, Asian American Women at Work)是包括《四个妇女》(Four Women)、《新领域》(On New Ground)、《口述历史》(Talking History)和《坦率直言》(Frankly Speaking)等四个短片的系列记录片,反映亚裔美国妇女在工作中的各个侧面。《四个妇女》表彰四名亚裔妇女的杰出工作。韩裔的海蒂(Heidi)是一名社区社会工作者,热心帮助韩国移民适应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第二代华

裔妇女萨拉(Sara)是一名建筑系大学教授,设计新式公寓改进移民家庭的居住条件。第二代菲律宾裔妇女医生雪莉(Shierley)领导一所社区诊所,工作重,责任大,为了新移民的健康兢兢业业地工作。第二代华裔妇女帕特(Pat)是从旅馆清洁工成长起来的工会代表。她敢想敢说,为维护大部分为新移民的旅馆清洁工的利益不遗余力。她们都既有理想,又有勇气,脚踏实地,将自己的才能与精力用于保障维护亚裔新移民的生活与权利,是新一代美国亚裔妇女的榜样。由丁碧兰(Loni Ding)编导的《新领域》记述十名亚裔妇女如何在传统的男性领域中,向传统挑战,实现个人理想,成为股票经纪人、警官、划艇教练、电焊工、药剂师、服装设计师、法官和新闻主播。《口述历史》讲述五名亚裔妇女移民美国的个人经历。她们分别从日本、中国、韩国、菲律宾和老挝来到美国。虽然国籍不同,移民时间迥异,她们都努力适应异国文化,努力为自己及其家庭创造新生活。《坦率直言》通过高中学生与老师、雇主的座谈讨论,反映这些年轻亚裔女孩如何面对从少年期到青年期的转变而引起的挑战。^[21]

在这些由亚裔美国人制作反映亚裔美国人的新潮纪录片中,阿瑟·曾(Arthur Dong)于1989年拍摄的《美国紫禁城》(Forbidden City, U.S.A.)最引人注目,获得最佳种族研究影片金奖、最佳种族文化纪录片特奖等多项大奖。该片多姿多彩,引人入胜。通过历史影片的剪辑以及与当年演员和观众的口述访谈,它将观众领入半个世纪前旧金山唐人街中国人开办的夜总会“紫禁城”(Forbidden City)。紫禁城曾是三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国际旅游热点,是当时全美由华人主持的几家夜总会之一。紫禁城夜总会的兴盛有其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时兵工厂。军备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许多美国人有节余。因战时生活消费品匮乏,人们便将余钱投入夜总会,娱乐消遣。同其他美国人一样,华裔美国人此时也摆脱传统束缚,涌入夜总会,调剂生活。由华人管理亚裔演员表演的紫禁城夜总会便应运而生。正如该片编导

阿瑟·曾所说：“我们华裔美国人不仅懂得如何刻苦工作，我们也懂得如何消遣快乐。”^[22]许多华裔年轻人从业余歌迷舞迷开始成为专业歌手与表演家，组成紫禁城表演团，表明年轻一代的亚裔美国人在三、四十年代已开始向种族与文化障碍挑战，寻求自我实现。^[23]

《缝纫女工》(Sewing Women)是阿瑟·曾拍摄的又一优秀纪录片，曾获奥斯卡优秀纪录片奖提名。该片记录一个中国移民妇女在被战争蹂躏的中国大地辗转逃难，最后抵达美国，以缝纫为生。^[24]该片着重表现这种突兀的文化转换所带来的困惑恐惧为所有美国移民面临的共同考验。该片是关于家庭、文化差异以及妇女的作用等主题的优秀参考资料。

华裔美国妇女不仅在美国大众文化中被描写为新奇性感的玩物，在学术著作中，她们也长时期被忽视遗忘。笔者认为，华裔美国妇女研究史学史主要经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此时期华裔妇女在美国的经历完全被忽视。第二时期即20世纪60至70年代，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开始将华裔美国妇女的历史纳入华裔美国史。第三时期即本世纪80至90年代，历史学家开始以专著论述华裔美国妇女的历史。

在第一时期，由于当时美国公众的反华情绪以及美国政府自1870年以来的排华法令及其实施，多数史学家视中国人为“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并从解决这一“问题”着手，多方面考察这一时期的反华暴力运动与排华法的通过与实施的过程。玛丽·柯立芝在其《中国移民》一书中，着重讨论排华法。作为第一部讨论中国移民的重要学术著作，该书基于地方报纸与公共档案，论证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工会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及其煽起的反华排外情绪是推动排华法令立案通过的所有因素中的第一要因。^[25]虽然该书在出版后遭到一些保守史学家的批评攻击，书中的广博史料与缜密论证大大加深了学术界对华裔美国历史的理解。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C. Miller)